

成长与启示——郭沫若与乡土中国

□ 黄大军 伊彩霞

一、巴山蜀水与民间文艺的滋养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郭沫若家乡乐山乃历史文化名城，古时该地盛产色香并胜的海棠，故有“海棠香国”的美名。此间素为历代文人名士所吟咏与钟爱。郭沫若出生地铜河沙湾，本地人以“绥山毓秀，沫水钟灵”自诩，这方以峨眉山、大渡河为胜境的水土，塑就了郭沫若最初的心灵视野。

“人是自然之子，自然不但生成和养育人的肉身，也生成和养育人的心灵、人的精神。”^{[1]218} 幼年沫若沉浸于家乡的山川形胜，无忧无虑，快乐成长。峨眉山秀甲天下，奇峰挺秀、山峦起伏，且四季多变、四时不同，大渡河季节性涨落，时而狂暴壮美，时而清秀姣好。年幼的沫若时常凝望着云雾迷茫的峨眉山与湍流滚滚的大渡河出神。那种“家在峨眉画里”的怡然常常让他融化其间，感到“峨眉山在笑，大渡河在轻歌曼舞”^{[2]22}。离沙湾不远，从峨眉山麓流下的茶溪，则流淌着沫若儿时垂钓与游玩的日常欢欣。在少年沫若的成长中，既满载着峨眉山麓、大渡河畔与兄弟姐妹一起唱儿歌、放风筝、奔跑嬉戏时的欢声笑语，也分享着家乡的种种田园之乐——农夫耕耘时唱的秧歌，撑船人、拉纤人唱的船夫曲，牧童横骑水牛背上吹的芦笛……古人说：“天下山水在蜀中，蜀之山水在嘉州”。从沙湾童年到青少年求学的嘉定府、成都，四川的峨眉山、高标山、凌云山、乌尤山、大渡河、岷江、青衣江、锦江等名山大川都给予郭沫若青春人格以深浓的陶冶。这个意义上的“大自然是一本打开的书，是一本打开的哲学书，是一本打开的诗集，是一本打开的画册，是一本打开的乐谱”^{[1]220}，更是养育这位文豪的文海诗渊。古语曰“文章江山助”。从少作《茶溪》，到作者多年后写出的《序我的诗》《峨眉山下》《峨眉山上的白雪》等美文，从他家乡的沫水（大渡河）和若水（现在的雅河），为自己取笔名“沫若”，到后来诗作中以峨眉山上的一滴清泉自况，尤其是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无不饱含着巴山蜀水的雄奇与灵秀。

然而，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过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



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3]74} 无疑郭沫若艺术人格的形成也可作如是观。如果说幼年沫若在崇俊幽美的大自然中孕育了美好的心灵、超拔的性格，是青山绿水给他上了审美人生的第一课，那么天府之国荡漾着山光水色的民间文艺则最先催燃了他的艺术天性。这种影响首先来自母亲的诗教。郭沫若曾言：“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4]173} 郭母天资聪颖，能粗通文字，暗诵诗词，还可谈弹词，说佛偈。尚在襁褓期间，母亲就将古词和儿歌当催眠曲唱给他听，二三岁时教他口诵唐诗，所以在感受诗美、诗境、诗律方面，母亲的诗教早早地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心灵基础。其次，郭沫若幼年时代深受家乡流传的“民歌、童谣、神话、传说、童话、故事、川戏、木偶等民间文学的熏陶”^{[5]8}，大大激发了童稚期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儿时念过的童谣《月儿走》、《月儿光光》，或展现了“轻淡的银光幻境”，给人“清醒的陶醉”^{[6]20}，或描绘了新月光中，洗衣女孩边走边歌的美妙剧景。这种甜美的画境不仅融入了他的生命，还在意境与修辞方面渗入了他日后的诗作，其中《女神·新月》就“有意无意”借用了这两首儿歌的形神。同样，他的代表作《凤凰涅槃》的创作灵感与诗篇节奏，则是采自乐山城肖公嘴大渡河上船夫的号子声。母亲给他说唱的弹词段子《牛郎织女相会》《白蛇传》《岳武穆》《二十一史弹词》等，则以丰富的内容、多彩的形式，影响着 he 后来的戏剧创作。其中，童话剧《广寒宫》、历史剧《虎符》就都运用了弹唱素材《张果老砍柴》。吴腾凰曾言：“音韵欢快的儿歌，倾吐肝肠的秧歌，大渡河上震撼云天的船夫号子，那引人入胜的童话、故事，‘不胜追羨’的‘圣

谕善书’，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使生活在‘天国’里的郭开贞不但获得了无穷的乐趣，而且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艺术的启迪，这对他一生的创作活动影响至深。”^{[5]10}

二、“神、贤、匪、鬼”哺育的自由天性

郭沫若之所以具有昂首天外、自由放达的浪漫人格，除了得自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外，还与巴蜀的神话传说与佛道文化，巴蜀历代文人崇尚自然、讴歌生命的人文传统，铜河沙湾的江湖民风、土匪文化，以及当地乡场盛行的巫鬼文化密不可分。歌德曾精辟地阐述过“天

才”个体与时代机制、群体积累的关系，他认为“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严格地说，可以看成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我们个人是微乎其微的一样。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有多大成就”^{[7]20}。郭沫若狂飙飞腾、浩荡充沛的生命意识与自然人格就扎根于巴蜀的区域文化，需要从集体经验与隐性传承方面多角度分析。巴蜀大盆地自古被视为“西僻之国”，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其更多地游离于中原文化圈而自成一统，封建礼教文化的控制相对松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又使该地跻身人类主要发祥地之一，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化、规模巨大的古蜀城市文明。远古时，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巫鬼文化）属于同一类型，两者间的文化融合亦源远流长，最终形成长江流域的楚文化与北方中原的儒文化分庭抗礼的局面。相对于北方儒家伦理文化的严谨，巴蜀文明更具崇仙慕道、原始瑰奇的生命自由。这种区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不仅在意识层面影响制约着 20 世纪巴蜀作家，也在无意识层面熏染、铸造着巴蜀作家的个性人格”^{[8]71}。郭沫若的人文性格、审美理想、艺术个性就深印着这种不灭的乡土底色。这具体呈现如下。

其一，巴蜀大盆地神话丰富、体系完整，以《山海经》《华阳国志》《本蜀论》《蜀工本纪》为代表的典籍生动记述了巴蜀大地流传的大量神话、传说、故事，那种立足图腾崇拜，崇尚万物有灵、追求生命不朽、颂扬英雄豪气、寻觅诗意栖居的自然感悟与神性思维，作为人类原始心灵的再现，“厚重地积淀于巴蜀大盆地的人文意识深处，成为巴蜀区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我国语言学领域里的一位杰出的大师,他在探讨语言文字起源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语言起源问题是伴随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提出来的问题,它曾引起了欧洲很多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注意,但在中国,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人研究,章太炎则首次进行了研究,在他许多讲演文稿、论文中都探讨了这个问题,他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指明语言的起源是出于对客观事物的描绘,这在他的《论语言文字之学》可以看出来,文中指出:“语言何自起乎?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非必恣意妄称也。一切言语皆有其根,先征之有形之物,则可见矣。”此外,章太炎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物之得名,大都由于感觉。感觉之怪异者,刺激视听,眩惑神思,则必为之立一特别之名,其无所怪异者,则不为特名,而唯以发声之语命之。简言之,言语之分,由感受之顺,违而起也。”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章太炎认为感觉决定了事物的命名,似乎有点唯心主义,但仔细琢磨这段话,我们可以领会到章太炎所指的感觉并不是通常说的感觉的含义,从他的《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里他把“感觉”改为“触受”,这就更容易理解了,“触受”是一种实的感觉,它决定了物之得名,运用我们

所学的哲学知识,章太炎显然是想要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虽然并不完全科学,但他把握了正确的方向,为后人进行研究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基础。再来看文字起源,章太炎认为文字最初起源于图画,在《墟书·订文》中,他指出:“吾闻斯宾塞尔之言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故非有二也。’”人类最原始的造字方法,象形字,就是一种图画文字,从原始社会最简单的图画和花纹产生出来,拥有象征性质,随后产生指事和会意两种造字法,从本质上来说,这三种造字法都是通过事物的形象特征造出字来的,随着人们的认识逐渐增强,许多实体事物和抽象事物是画不出来的,为适应需要便随之发明了形声、转注、假借这三种造字法,因此,“六书”所造出来的字基本囊括了我们所需要的文字。

章太炎对于古代音韵的研究也有着很深的造诣。关于这个还有一个章太炎与刘半农的轶事,话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中,北大教授刘半农提倡“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在采访章太炎的时候,问道其对白话文是如何看待的,章太炎回答说白话文都是根



文字学的贡献 章太炎对语言

□ 熊湘华

域文化性格的特色根源和区域精神核心的原始意象及一种集体无意识^[1]。巴蜀又是佛道文化昌盛的所在。四川位于封建帝国文化的边缘地带,自东汉以来,这里就是驰名海内的宗教文化圣地,土著道教与东传佛教在此积淀深厚、传承悠久,形成仙佛神话、修真故事广泛流传,宗教建筑、神佛造像纷然林立的特殊地域文化景观。“巴蜀半道,尤重老子之术”的宗教信仰,以及以蜀籍禅宗大师马祖道一为代表的巴蜀禅宗,均洋溢着蓬勃的生命精神,流泻着无尽的生命热力,缔造着和谐的天人理想。

其二,巴蜀人文传统深厚。其中,尤以特色鲜明的蜀学传统与激情旷达的诗学传统高标独举。“蜀学”地域特色形成于两宋,彼时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重权变而讲人情,融合佛老,杂之纵横,兼容并包,自成一派”^[2]。近代蜀学弘扬传统,提倡新学、开拓进取,产生了廖平、蒙文通、刘咸炘、吴玉章、吴虞等一大批大师精英。历代巴蜀文人亲炙这种开放的思想文化传统,形成了以陈子昂、李白、苏轼、苏舜钦、李调元等为代表的激情一脉,其浪漫飘逸的诗学个性,就像文化心理中的一条深深的河床,以一种宏大的开阔力量推动着巴

蜀文学的自由创造与青春永驻。

其三,巴蜀自古就是蛮夷之地,民风剽悍,铜河沙湾作为山野边陲,更是穷山僻水“刁民”横生。这里袍哥遍地、悍匪横行,江湖色彩浓厚。但在郭沫若的记述中,这里俨然《水浒》世界,这里的“匪”就好像《三国志》或《水浒》中的人物。他们颇具游侠之风,标榜义气,尽管凶横、劫富,却不为害乡里。从郭氏家族方面看,“背着两个麻布上川”^[3]的祖先已带有闯荡江湖的色彩,而绰号“金脸大王”(“金刚佛”)的祖父就曾是沙湾码头的舵把子,性情豪爽、疏财仗义、广交宾朋,到其父亲时仍有结交江湖人士的遗风,至郭沫若时当地有的土匪还是他儿时的玩伴,郭家也曾两次深感土匪的义气,儿时的他还曾帮助过土匪摆脱追捕,这都使郭沫若从小浸润了很深的“匪气”,有助于其叛逆性格的雕琢。

其四,当地民间鬼文化也曾哺育过郭沫若的童年经验。《嘉定府志》有言:“州俗信鬼,自古已然。”^[4]儿时郭沫若鬼故事的两大来源是父亲与大舅,父亲两次遇鬼的经历,讲得让人身临其境,大舅说的鬼故事不仅有书为证,而且理趣兼备,让人毛骨悚然又欲罢不能。陈晓春指出:“鬼故事恐怖奇幻

的场景,在相悖于封建主流文化中正平和的情调的同时,又具有浪漫主义所推崇的审美情趣,给童年郭沫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5]吴定宇则肯定:“这种风俗对开启郭沫若的神话思维,不无积极意义”^[6]。

参考文献

- [1]王先霭.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A].党圣元、刘瑞弘选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2]郭沫若.序我的诗[A].郭沫若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 [3]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4]郭沫若.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A].郭沫若论创作[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 [5]吴腾凰.郭沫若与读书[M].济南:明天出版社,1997.
 - [6]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7]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8]邓经武.论郭沫若的“创造情结”——人类文化学的个案研究[A].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 [9]邓经武.巴蜀文化的肇始:神话和上古传说[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 [10]曾加荣.初论郭沫若对蜀学传统的继承[A].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C].成都:巴蜀书社,2008.
 - [11]郭沫若.少年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12]吴定宇.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 [13]陈晓春.从乡土、家庭的“边缘性”看郭沫若叛逆性格的必然性[A].李怡、蔡震编.郭沫若评说九十年[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郭沫若文论的生态意蕴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号:12532385。
★作者黄大军为牡丹江师范学院讲师,博士;作者伊彩霞为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硕士。